

“三言二拍”市民阶层流动叙事探析

朱琳琳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9日

摘要

“三言二拍”生动描绘了明代中后期市井百姓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景象, 清晰展现出市民阶层的整体生活面貌与深层心理世界。从中可以看出,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启蒙思潮广泛传播的时代背景下, 市民阶层迅速崛起, 其渴望财富、追求平等的思想意识已经萌芽, 对传统儒家主流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市民阶层试图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体系, 并努力争取社会主流地位, 不断寻求着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文章从叙事角度切入, 立足文本, 梳理出“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流动的四大叙事类型和过程: 步入仕途、经商致富、入赘富商、意外发迹, 并深入探析其背后所蕴含着的丰富叙事内涵与审美价值。

关键词

“三言二拍”, 市民阶层, 阶层流动, 叙事

An Analysis of Narratives on Social Mobility within the Urban Class in the “Three Words and Two Pats”

Linlin Zhu

School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17, 2026; published: April 29, 2026

Abstract

The “Three Words and Two Pats” vividly depicts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daily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clearly revealing the overall lifestyle and the rich inner world of the urban class. As evidenced by the “Three Words and Two Pa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Enlightenment ideas, the urban middle class rose rapidly. Their aspirations for wealth and pursuit of equality had already

begun to take root, exerting a certain impact on mainstream Confucian thought. The urban middle class sought to establish its own social value system, strived to secure a mainstream position in society, and constantly sought opportunities fo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From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grounded in the texts, this study identifies four major narrative type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mobility within the “Three Words and Two Pats”: entering the civil service, amassing wealth through commerce, marrying into a wealthy merchant family, and achieving sudden succes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rich narrative implications and aesthetic values inherent in these narratives.

Keywords

“Three Words and Two Pats”,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Mobility,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冯梦龙、凌濛初二人编纂整理的“三言二拍”，生动描绘了市井百姓的生活景象，清晰呈现出明代中后期三教九流的生活面貌和情感世界。从“三言二拍”中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渐渐崛起，渴求财富与追求平等的市民意识已然觉醒。这一阶层对传统儒家主流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并努力构建自我的社会价值体系，通过种种方式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市民的阶层流动蕴含着深刻的叙事学内涵，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深入探讨。

目前，学界尚未对“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流动叙事这一方面展开过多的研究，故本次研究将重点对此进行探索。研究将从叙事角度切入，结合明代市民阶层地位的一般状况，梳理出“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向上流动的叙事类型和过程，以求展现出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生动活泼的跃升群像，并分析其背后所蕴含的叙事学意义和审美价值，以丰富当今学界对“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的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现状

“三言二拍”的国外研究形成了日本奠基、欧美深耕、亚洲其他国家侧重传播的整体格局，以版本发掘、多语种译介为基础，逐步拓展至系统考据、理论阐释与文学批评等研究领域，成为推动这一经典世界化传播与学术深化的核心力量。

日本是“三言二拍”海外研究的开创者与核心阵地。1920年，盐谷温、长泽规矩也率先在《斯文》杂志上发表关于“三言二拍”的文章，使得小说重回人们视野。二十世纪专门从事“三言二拍”研究的海外学者中也以日本学者居多。日本学者的研究多数以实证考据为核心，深耕版本研究与故事考证。小野四平《中国近世短篇白话小说研究》等成果极具参考价值，同时译本体系完善，还催生了“日本三言”等改编创作。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以《今古奇观》传播最广，研究多聚焦译介与本土化改编，然而文本深度研究则较为匮乏。

而欧美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起步早、理论性突出，1735年法国率先将相关作品译入欧洲，二十世纪英译本数量与质量居西方首位。美国韩南、夏志清以及英国西里尔·伯奇等为代表学者，研究侧重于叙事艺术、文化内涵与跨文化比较。韩南考证成书年代与叙事手法，而夏志清则侧重剖析作品中社会与个人的冲突。然而，欧美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研究善用西方文论，兼具人文关怀，但常脱离

中国历史文化语境，易产生价值评判偏差。

由此可见，国外研究主要围绕版本考据、叙事艺术、文化阐释、跨文化传播及文史互证等方面展开。不过，就“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的研究而言，目前国外相关成果仍较为欠缺[1]。

2.2. 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士人阶层、商人阶层、明代中后期社会背景与历史变迁等方面。

首先是对士人阶级的研究。国内学者沈金浩在《论“三言”“二拍”的科举观与门第观》一文中首先指出“三言”、“二拍”是十分看重读书-科举-做官这条人生道路的，通过科举做官仍是小说中人物的首选之路，认为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在“三言二拍”中并未有多大的改变。沈金浩认为“三言二拍”的作者仍是把读书仕宦之家视为最高的门第，尽管作者在小说中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反映了晚明繁荣的商品经济，但是其根本仍是传统士大夫的立场。对于商人的态度，则只是不再笼统地贬低商人，肯定部分商人，赞扬他们身上的美德，认同了商人是一支活跃、重要的社会力量[2]。

国内学者卢捷在他的论文《落魄文人出路的理想探索——略论“三言”“二拍”中的秀才形象》中具体探究了“三言二拍”中秀才这一形象，他对书中的秀才形象进行了梳理，得出这些秀才在科举及第之前大多家境贫寒，无力成家立业；虽然才华出众却往往科场失意；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又多是美梦成真。这种模式化的人生历程既渗透了穷秀才们的辛酸苦痛，又寄予了他们人生梦想。他们也许有别的出路，比如弃儒经商，但是对于穷秀才们而言，经商亦难，倒不如一心扑在科举之路上，做着“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富贵美梦[3]。

马衍在《世俗世界和精神家园中的文士范本——“三言二拍”和〈六十种曲〉文士形象比较》一文中则指出，“三言二拍”中的文士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展现了他们在光怪陆离的世俗世界中的真实境遇、行为与情感，他们大多已失去了经典意义的光环，尽管也还诵读诗书，但有的却夹杂着商人的狡猾、小市民的算计，理想的文士形象已渐行渐远，日趋模糊。学者还指出文士形象的变化与明代主流的市民文化相适应，符合“三言二拍”作为市民白话小说、满足市民文化需求与审美主张的文学基调[4]。

薛英杰在《阶层流动与科举压力：晚明通俗小说中的文人赘婚故事》一文中探讨了文人入赘所体现的社会阶层流动现象，他指出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的晚明通俗小说中有许多篇目都包含文人赘婚的情节，反映了文人纾解科举压力、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需要。这与本文的研究有共通之处，均指出文人阶层通过入赘富商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5]。

其次，国内学者对“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展开了丰富且深入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由于不少商人作出了入仕的人生选择，学者们往往会将商人形象与士人形象关联起来进行探讨。刘莉在《从“三言”“二拍”看晚明之徽商》中指出，“三言”、“二拍”相对集中地展示了徽商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及社会大众对其态度的变化。晚明时期，传统的四民关系备受挑战。政治源于经济的天然属性，使徽商在资本富足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逐利而追逐更高的社会地位。商人表达出政治诉求，为了入仕，他们从壮大自我、交好官府、改善形象等方面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这不仅使商人们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也促进了他们商业的发展[6]。

王桂清在《从“三言”“二拍”中商人入仕途径看商人的官本位意识情结》中也深入探究了商人入仕这一行为。商人具备的崇官心理正是中国官僚体制下官本位意识的产物。在人们的意识中，一直以来把为官当作最优的职业选择。只有当官才能提高政治地位，才是积聚大量财富的捷径。所以他们一旦经商致富，便通过科举、捐纳、联姻等方式向官场发展，走向了“士商融合”、“亦官亦商”的人生道路。学者认为商人入仕这一人生走向会使原本可以成为变革社会新生力量的商人阶层成为社会的附庸，不仅导

致商人自己人生定位的错位，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具有负面影响[7]。

王永的论文《“士商合流”与“贾而好儒”——从“三言”“二拍”看明中叶商品经济的特征》指出，“士商合流”、“贾而好儒”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突出现象。学者指出明中叶以后商业的迅猛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迅速发家致富的道路，即经商，许多士人也由此开始了向商人身份的转化。而另一方面，商人又愿意交结士流，这二者共同促成了“士商合流”的社会局面。此外，士人加入商人队伍所带来的儒家思想也促成了商业经济中新的义利观，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三言二拍”的商人们大多注重商业道德，具有美好品质。与此同时，王永与王桂清看法一致，均认为商人发家致富之后走上仕途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明中叶的商品经济没有导致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体制[8]。

对于“三言二拍”中所体现的时代背景，胡小安在《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中后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一文中进行了较为完善的探究。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渐繁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对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影响。首先在生活方式上，明中后期社会时尚日趋奢靡，同以前“勤俭持家”的现象大相径庭。其次是传统“士农工商”四民观念的转变，以商贾为重、视商业为善业的社会潮流开始形成，人们难以抵挡财富的诱惑，弃农经商、弃儒经商渐成风气，商人地位显著提高[9]。

王言锋在《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与〈三言〉〈二拍〉的财富观》一文中也探究了明中叶的商品经济发展情况，指出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其中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顺应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肯定人的正常欲求与私心。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与肯定欲望、实用主义思想观念的双重冲击下，人们冲破了旧有的价值观，不再以谈利为耻，而以致富为荣；旧的财富观受到冲击，新的财富观应运而生[10]。

经过文献资料的查找与分析，可发现大多学者将视野聚焦在“三言二拍”中某个固定的阶层，或是“四民之首”的士人阶级，或是后来者居上的商人阶级，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视野放在市民阶层的互相变化之上，最多也只是关注到士商之间的关系，未能纵观四大阶层对“三言二拍”展开较为宏观的市民阶层研究。

因此，相较于现如今国内学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市民阶层的整体流动叙事暂无人涉及，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学术意义。研究将重点关注“三言二拍”中能够反映阶层向上流动的篇目，从而对市民阶层的向上流动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总结，梳理出阶层向上流动的类型与过程，展现出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流动群像，并思考这一流动中所含有的叙事学意义与美学价值。

3. 明代“三言二拍”的“市民”概念与叙事学视角

3.1. 明代“市民阶层”的概念界定

士、农、工、商是古代“四民”，为四个社会群体，这一分类主要是在战国之后逐渐形成的。“士农工商”的四民概念出自《管子·小匡》中“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一言[11]。《春秋·谷梁传》指出“四民分业”的顺序为：士、商、农、工[12]，但其排列本身不分高低贵贱。

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阶层是贵族，皇亲贵胄、达官显贵享有特权和特殊待遇。战国之前的春秋时期，士基本上还在贵族阶层中，属于贵族的最低一等。士人包括读书人、学者和进士，考取功名进入官僚体系。而春秋时期的“商”阶层主要是指具备规模而进行经营的生意人，其中不少可能还是原来的贵族，所以在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并不低，比如陶朱公。而普通的小商贩，当时被称为“贾人”，是平民阶层的最末一等，地位低下。当时平民阶层的排序是农、商、工、贾，而非士、农、工、商。战国之后，士彻底沦为平民阶层，而商人的地位也不断下降，降到同贾人一样的地位，而且商、贾不分，统称为商人。于

是，平民阶层就由农、商、工、贾演变成士、农、工、商。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工商业城镇渐渐遍布在全国各地，比如扬州、苏州、杭州、广州等。城镇的繁荣直接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并成为明代中后期基层社会的主要群体。市民阶层，狭义地说，是指平民等级中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但宋明清商贾、百工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并努力寻求主流社会地位，向上流动。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市民阶层可以理解为居住在城市中的百姓，它不只代表着商人与手工业者，也包含着一定的农民与一部分的儒生在内。城市经济的兴起吸引了大批的农民涌入到城镇中，他们在城市扎根定居，整日游走于市井小巷之间，轻松融入到市井生活之中，自然而然成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

至于为何一部分儒生归属于市民阶层中，则有以下理由支撑：首先，儒生有两类形象，一类是官僚分子，另一类则是穷秀才与科举的淘汰者。第二类儒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与平民无异。其次，在明代，士人的行为呈现出强烈的市民化特点。士人居住在市井之中，在浓郁市井气息的浸染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在向市民阶层靠拢。还有些科举落第、仕途不明的儒生会在市井中从事一些简单职业养活自己，比如当私塾先生、卖弄字画，这就与市民阶层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知明代的市民阶层顺应时代与社会背景，在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下逐渐壮大，它在继承古代“四民”制度的同时也具备着个性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活跃在各大城市中的士、农、工、商四类群体，展现出市民化、世俗化、大众化的特点。

3.2. 明代市民阶层的转变与流动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百态日新月异，充满生机活力，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日益增长。市民阶层所信守的社会准则与传统体系产生冲突，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方面都产生了不相容的矛盾，从而影响到明中后期社会的整体风貌。冯梦龙、凌濛初二人编纂整理的“三言二拍”正是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整体生存状况，展现出市民阶层的转变与流动。

明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条件较为宽松，以城市工商业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渐活跃，市民意识开始觉醒，渴望财富、追求享乐、寻求平等的思想意识已经萌芽。明代中后期的学术界也掀起一阵启蒙思潮，思想家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在从各自的角度阐释新环境下的新兴思想，批判落后思想，提出对人性的解放，鼓励人们直视自己最本能的欲望。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新兴思想的传播，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情感世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开始构建起一套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一定的冲击。他们渴望将社会主流地位把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寻求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推动了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源源不断向上流动的社会局面。

冯梦龙、凌濛初二人编纂整理的“三言二拍”中有许多作品都展现了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努力实现阶层流动的图景。现立足于“三言二拍”原本，以叙事角度切入，梳理“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流动的叙事类型和过程，并探寻其背后所蕴含的叙事学内涵、社会史意义与审美价值。

3.3. 叙事学视角：从情节类型到形式分析

本文所说的“叙事”，不仅是对故事内容的类型归纳，更借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分析路径，将叙事视为一种话语建构行为。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叙事分析应区分“故事”与“话语”，并从时间、语式与语态等层面考察叙事的运作方式。就“三言二拍”而言，市民阶层的流动不

仅体现为一组情节母题，更呈现为一种稳定的叙事结构：低微身份 - 跃升契机 - 身份转换 - 社会认可。这一结构通过时序安排、聚焦方式、叙述者干预等策略，不断强化社会向上流动的叙事逻辑。

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社会叙事学视角，将叙事形式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符号实践。在“三言二拍”的跃升叙事中，叙事形式的结构选择本身就折射着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处境：入仕类叙事多采用线性、闭合的因果链，如“苦读 - 中举 - 为官 - 荣耀”，体现出科举制度作为阶层流动通道在叙事中的仪式化呈现；而意外发迹类叙事类型则大量运用巧合、突转等手法，暴露了常规流动渠道的阻滞。换言之，叙事形式的选择本身就是社会心态的审美表征。

基于上述理论资源，本文对“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流动叙事的分析，将聚焦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是叙事结构，提炼阶层流动叙事的基本结构单元，考察其在各种叙事类型中的变体与共性。第二是探究阶层流动的叙事策略，分析叙述者如何通过情节安排、聚焦方式、时间设定、评论插入等手段，引导读者对叙事流动产生认同与思考。第三是关注叙事功能，揭示各种叙事形式在明代中后期社会语境中的文化意涵。它们既是市民阶层向上流动欲望的文学呈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解决。由此，研究超越情节类型的表层归纳，阐明“三言二拍”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运作，参与建构市民阶层的自我想象与文化身份。

4. “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向上流动的叙事类型

4.1. 步入仕途

穿上官服，踏入官场，步入仕途，曾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他们都渴望从普通平民摇身一变，成为高高在上的官员，从“农、工、商”阶层跻身“士”这一最高社会层级，实现阶层的完美跨越。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人生三大喜事为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而金榜题名即科举中第，被列为三大喜事之首，足见入仕做官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之重。在“三言二拍”中，入仕是市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科考，二是捐纳。

科考是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影响深远，为想要入仕为官的人指明了最直接的道路——科举考试。“三言二拍”中很多人物都是通过科举登第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成功跻身最高等级的官宦阶层。比如在《初刻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中，开典当行的徽州商人金朝奉为躲避朝廷点绣女，慌乱之中将女儿许配给穷秀才韩师愈，但是当点绣女的讹传平息时却暗自懊悔，觉得韩师愈“是个穷儒”，“满脸饿文，一世也不能勾发迹”，因看不起韩师愈而心生悔婚之意。待韩师愈“春秋两闹，联登甲第”，金朝奉又转而感叹“若预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儿与他为妾也情愿了”([13], p. 149)。前后话语的并置，不仅完成了叙事的戏剧性转折，更深刻揭示了商人对“士”这一身份的功利态度。他们尊重的并非士人本身，而是士人所代表的权力与地位。韩师愈科举中第前不过是被金朝奉这类商贾之人瞧不起的穷儒生，但是在科举中第为官之后，他的身份不可同日而语，阶层提升至官宦之家，自然受人尊敬。

再如《警世通言》第十七卷《钝秀才一朝交泰》中的“钝秀才”马德称，他家道中落，时运不济，科举屡试不中，彻底沦落为一个空有才情的穷秀才。他遭受着朋友的背叛与欺诈，忍耐着命运的戏弄与众人的嘲讽，不坠青云之志，最终科举及第，金榜题名，连连升官，风光无限。马德称通过科考之路发迹变泰，改变了自己坎坷的命运人生，从一介破落书生跃升为官宦阶层，实现了自身阶层的向上流动，摆脱了“钝秀才”的名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插入评议：“时运未通，纵有才学，亦无处施展；时运一通，便步步高升。”这一作者评议表面上是为科举正名，深层却暴露了制度本身的偶然性，即才学与成功之间并非必然对应。

而捐纳则是走进官场的隐形手段，是步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喻世明言》卷三十一说朝廷“卖官鬻

爵，视官职尊卑，入钱多少，各有定价：欲为三公者，价千万；欲为卿者，价五百万”、“若入得钱多，出为刺史，入为尚书”([14], p. 291)。表面上这说的是“汉朝”事，可是一查出处，便得知这是作者添写的，说的就是当朝事[3]。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通过捐纳为官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三言二拍”中，涉及到捐纳得官的描写众多。如《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艚》(《初刻》卷二十二)中巨富郭七郎花了五千两银子买得刺史一职；《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卷三十一)中的富户之子曹可成自小纳粟入监，成人后挥金如土，尽干败家之事，依靠妻子赵春儿的努力，用千金买下同安县二尹的官位，最终曹家庄发迹为宦门巨室，阶层升至最高等级。

再如《徐老仆义愤成家》(《醒》卷三十五)中，徐老仆阿寄发迹之后给主人的两个儿子“俱纳个监生，优免若干田役”([15], p. 735)。《张廷秀逃生救父》(《醒》卷二十)中王员外为女婿赵昂“纳粟入监”([6], p. 376)，谋得官位。这些富商们以财富为武器，打破了士商之间的壁垒，为自己创造出跻身“士”阶层的

4.2. 经商致富

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新兴思想萌发、市民心理变化，以及商人形象好转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商人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商人这一群体留给人们的不再是唯利是图、奸诈贪婪的刻板印象，而是丰富且具有魅力的一个阶层，很多时候也受到人们的尊敬与艳羡。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曾说过一句谚语：“一品官，二品客”([5], p. 12)，意为客商的地位仅次于高官；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也评议道：“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者”([16], p. 596)。叙事中插入的这些作者评议表明，明代中后期经商致富并不会使人沦为下等人，反而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人们的阶层。在明确经商致富属于阶层向上流动的范畴后，将对经商致富这类叙事类型展开简要分类。

首先，由经商致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第一种叙事类型是弃儒转商。穷书生通过经商获取大量财富，身份由穷儒转变为富商，实现阶层的提升。从传统观念来看，弃儒从商似乎是从地位最高的士人阶层跌落至最低的商人阶层，但事实并非如此，以现实视角审视，这其实是一种最实际、最真切的人生跃升。在明代市民的眼中，一介穷书生并不如富裕人家的子弟。以《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初刻》卷十)一文为例，徽州富商金朝奉更愿意将女儿许配给同为商贾之家的程家，而不愿意将其嫁与前途不明的穷秀才韩师愈。所以读书人纷纷弃儒经商其实也是及时转变道路的明智之举，不再执着于从读书做官这一条路实现发迹，经商同样也可以满足其发迹的抱负，走上人生巅峰。

弃儒经商的叙事模式，多表现为因仕途不明而转为经商，或是在时代风气与当地风俗的影响下决定改行从商。正如《二刻拍案惊奇》中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程宰“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但是因“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其次”，他决定和兄弟程案外出经商，最后“囊资丰富”，赚得盆满钵满([7], pp. 597-605)。再如《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奇“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但是却不幸“先人弃后，无心于此”，之后开起布店，一二年就“挣下一个老大家业”([6], pp. 188-206)，受人尊敬，说亲的人家纷至沓来。他们都放弃了读书之路，通过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也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用钱财堆积出了一条阶层向上流动之路。

其次，由经商致富提升阶层的第二种叙事类型则是弃农经商。城镇经济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的农业从业者弃农转商。何良俊曾说，明中叶以前，百姓“十九在田”，而正德之后，大批农民涌入到城市之中，经营商业，正如“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一言[17]。农业从业者弃农转商，一心趋利，赚得大量钱财，实现资本积累，由此实现阶层的提升。如《桂员外途穷忏悔》(《警》卷二十五)中桂富五“谓农夫利薄，商贩利厚”，于是放弃农业活动，转为经商。在故事中他“将薄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贩纱缎往燕京”([18], pp. 358-378)，后经历种种，最终发迹，成为大富之家。

再次，经商致富的第三种叙事类型则为壮大家业。这类人原本家中就是从事工商业，但是经营一般，停留在普通工商业阶层，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此类阶层流动的叙事模式是由小商人发迹为大商人，情节常常呈现为“继承家业-历经艰难-最终发迹”的叙事结构。比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鼃龙壳》（《初刻》卷一）中，书生文若虚因不持家业坐吃山空，“看见别人经商图利”，“便也思量做些生意”，竟“做了闽中一个富商”（[4], pp. 5-21）。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的商贾之子王生接续父志外出做生意，虽然几次遇劫，但是在杨氏的鼓励下坚持出去做生意，遂成大富之家。

最后，“三言二拍”中通过经商致富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还有一种叙事类型，即白手起家，实现发迹。这一类人凭借自己的卓越本领与经商才能最终发迹，积累大量财富，从平民百姓蜕变成大富之家，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比如《徐老仆义愤成家》中被长房、二房当作废物推给三房孤孀的老奴阿寄，他出于义愤外出经商，最终发达，挣得偌大家业。又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中汪革以烧木炭、办铁冶、办酤坊等工商业发家，“数年之间，发个大家事起来”（[5], p. 376）。

4.3. 入赘富商

“三言二拍”中存在一种通过市民阶层内部的融合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叙事类型，即入赘富商。此类情节书写呈现出高度程式化的叙事模式：时代背景设定为明代，人物多为有才却穷困潦倒的书生和家底丰厚的富商，故事情节发展往往是一介穷苦书生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或明确目的入赘到富裕商贾之家为婿，结局是穷书生在妻家的钱财资助下考取功名、飞黄腾达，而富商也因此光耀门楣。

入赘叙事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交换。对于穷书生而言，入赘富商之家既解决了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又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娶得美妻，还可为自己谋个光明前途，一举多得。他们借此摆脱了原本的穷酸之气，洋洋得意地享受着妻家提供的便利，自身阶层也随之上升。若将入赘美化一下，用更为官方的说法可称为“士商联姻”，读书人与经商之家相互结合，各取所需：读书人需要商人之家的钱财资助自己考取功名，而商贾之家则指望女婿金榜题名，荣耀自家门户。“普通文人入赘名门、联科及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幻想的产物，反映了文人纾解科举压力、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需要” [5]。

在“三言二拍”中不乏穷书生入赘富商的情节书写。《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文中，穷书生莫稽入赘到家大业大的团头金老人家，希望“俯就他家，一举两得”，最后在金家的钱财支持下“才学日进，名誉日起，二十三岁发解，连科及第”（[5], p. 259），着乌帽官袍，登官上任，好不风光。再如《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一文，“积祖豪富”的王员外看中了做木匠的张廷秀，“虽是小家出身，生得相貌堂堂，人材出众……定有科甲之分”的招赘之语将商人对士人前途的功利性期待表露无遗。同时，文本在此通过内聚焦方式细致呈现王员外的心理活动，“若得他为婿，后来中了科举，岂不光彩”（[6], pp. 380-381），这一心理描写将入赘的利益交换逻辑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又如《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钱秀才钱青被富商高赞选中作女婿，供他读书，最后一举成名。“三言二拍”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大多都是寒士入赘到富商之家，受到资助扶持考取功名，飞黄腾达，实现阶层的跃升。

4.4. 意外发迹

在“三言二拍”的众多故事中，有一类人运气极好，因意外发迹而改变整个人生，实现阶层的提升。经总结，意外发迹有两种固定的叙事模式：一是意外得财，偶然在某地掘得大量金银珠宝，自此发家，富甲一方；二是偶然机遇，遇到贵人指点，自此飞黄腾达。这两类意外发迹叙事模式都大量运用巧合、

突转等手法，以彰显其偶然性与非常规性。

意外得财这一情节在“三言二拍”中常常以人物掘藏或捡到财宝的行为体现。如《桂员外穷途忏悔》里的桂富五掘得恩人施家的窖藏一千五百金，私自置办田产，自此发家致富；《施润泽滩阙遇友》（《醒》卷十八）里的施润泽好人有好报，初次掘银，二次拾银，家底越发丰厚；《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初刻》卷一）中的“倒运汉”文若虚一转坏运气，从荒岛上拣得龟龙壳，以五万两卖给了波斯胡大店主玛宝哈，最后“做了闽中一个富商”（[4], p. 21）。作者最后的评议意味深长，“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表面上是宿命论的说教，深层却暴露了成功与个人努力之间的断裂。

再如《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警》卷二十二）中旧家子弟宋金在遭丈人所弃之后在一败落土地庙发现八箱财宝，在南京仪凤门买下大宅，门前开张典当铺，又置办多处田庄，成为“出乘舆马，入拥金资”（[9], p. 303）的钱员外，声名赫赫、容采光泽，社会底层的穷苦之人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家缠万贯的大员外，阶层实现向上的流动。意外的掘财大大充实了平民百姓的家底，使其一朝富裕而愈来愈富，进而摆脱底层阶级的穷苦命运，成为受人艳羡的人上人。

第二种意外发迹的情况则是偶然的机遇促使主人公得到某种成功。《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喻》卷十一）中的赵伯升因题诗机缘巧合得遇宋仁宗，被任命为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而《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警》卷六）一文中的俞良与赵伯升遭际相同，也因诗词获君王赏识，被赐高官。二人都是偶然得遇君王，并因诗词得到君王赏识，做得大官，享受荣华富贵，从普通人跃升到高官之位，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

再如《老门生三世报恩》（《警》卷十八）中的鲜于同，少年神童，胸藏万卷，博学多才，但年过五十却屡试不中，后阴差阳错被有私心的蒯遇时接连三次“错选”，最终得以做官，仕途顺利。尽管蒯遇时“爱少贱老”，刻意不录鲜于同，但鲜于同却因机缘巧合、阴差阳错，成功被起用，从穷书生跃升至官僚阶层。这正是因偶然机遇而意外发迹，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极佳案例。

5. “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流动的叙事内涵

5.1. 入仕跃升：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度渗入

科举叙事在“三言二拍”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叙事结构呈现出高度程式化的特征：苦读 - 中举 - 为官 - 荣耀。这一线性闭合的因果链条，在叙事层面强化了天道酬勤的传统信条。《钝秀才一朝交泰》中的马德称历经困顿终得及第、《韩秀才乘乱聘娇妻》中的韩师愈中举前后遭遇截然不同，这些叙事通过鲜明的前后对比，完成了对“学而优则仕”这一儒家理念的文学印证。作为社会阶层主要的流动方式，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选官制度，更是一种深层文化心理，规训着市民阶层对成功路径的想象。

捐纳叙事则呈现出另一种样貌。明代中后期捐纳盛行，以钱财换取官位成为现实可行的捷径。《钱多处白丁横带》中的郭七郎花五千两买得刺史、《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曹可成纳粟入监。然而，叙事对捐纳往往赋予道德模糊性，郭七郎最终倾家荡产，而曹可成的成功则有赖于道德补偿。这种叙事的处理方式，折射出市民阶层在价值层面的矛盾，他们明知财富可转化为权力，却在心理上难以完全摆脱对科举正途的道德认同。

更深一层看，入仕叙事的盛行揭示了市民阶层强烈的为官意识。许多经商致富的故事，最终都落脚于后人读书成名的结局。这一叙事上的“闭环”恰恰暴露出市民阶层在价值认同上的深层矛盾，他们虽然在经济上已经崛起，但在文化和心理上仍未摆脱对传统士人身份的仰视与向往，将士的身份视为社会地位的真正象征。在他们心中，财富积累只是手段，入仕为官才是价值归宿。这正是传统儒家思想深度渗入市民心理的鲜明体现。

“三言二拍”中，入仕是市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首要途径或最终途径，深刻反映了传统儒家思想对市民心理的深刻影响。尽管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但“士”作为四民之首的

社会排序依然难以撼动，入仕为官仍是阶层向上流动最被认可的正统途径。千年来的儒家传统并未因商品经济的冲击而瓦解，反而在市民的跃升想象中持续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

5.2. 经商致富：阶层向上流动的新出路

通过经商致富实现一定意义上的阶层流动是市民阶层所寻求到的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新出路，它具备两种内涵：其一是时代意识的闪现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大批市民阶层通过经商致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正是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对财富的肯定与需要，反映出时代意识中闪现着的功利思想。明代新兴思想的萌发推动市民解放禁锢自身欲望的枷锁，将他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对平等的向往合理化，鼓励他们直面内心欲望。

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李贽批判重农抑商的传统风气，褒扬商贾功绩，并倡导功利价值。在给友人的《又与焦弱侯》一信中慷慨而言：“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货，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9], p. 92）。李贽还提出人都有“势利之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等观点，对追求功利与富贵的行为心理给予肯定。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也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10], p. 543）等主张，将视野放在了人的日常生活中，肯定人的正常需求与合理欲望。这不仅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闪现着崭新的时代意识，而且还对传统思想造成强烈的冲击，呈现出以新兴市民阶层为代表的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

其二是平民视角中的自我腾飞，强调艰苦奋斗与美好品质。平民阶层的奋进叙事中，小人物亦能成就大作为。他们通过勤劳肯干的态度、出色的能力与义利兼备的商业观念实现了发家致富的现实理想，达成了平民视角下的阶层提升。在平民的观念中，财富本身便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权力的表达。“有钱能使鬼推磨”，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自然就掌握着相应的权力，得以攫取大量利益，享受着“上等人”的便利，实现着阶层的腾飞。

同时，具备美好品质的商人发家致富与贪婪狡诈的商人下场惨淡形成对比，比如善良仁义的施润泽慢慢发家，最终家大业大，而经营高利贷的郭七郎，贪婪势利，最终落得个倾家荡产的惨淡结局。鲜明的对比突显出美好品质有助于增长财富、促进前途发展，同时也批判了不仁不义之人，这是对美好品质的赞颂，也是对好人有好报的人生信条的宣扬，有力展现出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所发展出的以“义”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独特魅力。

5.3. 士商合流：阶层融合下的利益共赢

士商合流有两种叙事模式：第一种是“寒士 + 富商”的“士商联姻”模式；第二种是商人或其后代入仕的“商人入仕”模式。士商合流是两种阶层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阶层的融合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实现利益的共赢，达到阶层的向上流动。

首先着眼于“士商联姻”的叙事模式，其生动展现出士商两阶层在利益驱动下的联姻与融合。一般情况下，两方主人公分属寒士阶层与富商阶层，叙事情节相对来说较为固定，多表现为才貌俱佳的寒士入赘家底丰厚的富商，在富商的钱财资助下科举及第。在这种模式下，寒士阶层的所得利益表现为三点：一是解决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二是不费吹灰之力地娶得美妻，三是有大量钱财资助他参加科考，增加他科举登第、入仕为官的可能性；而商人阶层选择穷书生作为赘婿则是看中了他的读书才能与士人身份，渴望他科考成功，入仕为官，光耀门户。这类叙事在结构上形成一种固定的交换模式：寒士以其潜在的科举前景(文化资本)交换富商的资金支持(经济资本)，最终实现双方的“共赢”。寒士得

以入仕，富商得以光耀门楣。这种叙事模式在深层结构上揭示了阶层流动过程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转化机制。

从另一个角度看，士商联姻也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一种冲击。传统婚姻嫁娶讲究门当户对，一般都是地位相当的阶层相互交好。而处于“士农工商”首位的“士”与位列传统末位的“商”联姻，实在是悖于传统婚姻观念，是对“门当户对”这一婚姻观的反叛。然而，这种“共赢”的背后也隐含着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入赘者往往需让渡部分家庭主导权，叙事中常出现对赘婿身份的微妙焦虑，这反映了士人阶层在借助经济资本实现跃升时所付出的身份代价。

其次是第二种合流模式，“商人入仕”表现为富商自己入仕或者培养后人入仕。入仕手段分为两种，一种是正规的科举之路，一种是非常规的买官入仕。商人经商积累大量财富，掌握更好的社会资源，能够请到更优质的老师进行培育，进而增大了商人及其子弟入仕为官的可能性。比如《醒》卷十八中经商致富的施润泽请个先生在家教儿子读书；《醒》卷三的秦小官在经商发迹后“生下两个小孩，俱读书成名”（[6], p. 69）。而买官入仕则表现为以捐纳或者纳粟入监的方式买得职位较低的官位来做。

在“商人入仕”这种士商合流的模式中，可以看出商人阶层主动追求融入到士人阶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谋求更加稳定的发展，并光耀家族。另一方面，商人入仕也打破了传统士商阶层之间的壁垒，冲击了世家大族对宦官阶层的垄断，为士人阶层注入新的活力。

5.4. 意外发迹：虚构叙事中的真实心理

“三言二拍”的整体背景是明代社会，其叙事风格颇具生活气息，生动还原了明代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但是其中有些情节的发展却不同寻常，如意外掘金、得神仙指点、遭遇贵人、连连中举升官等。小说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插入非日常的情节，用细腻轻松的生活笔触描绘出不同寻常的情节发展。这些不同寻常的情节归属于意外发迹一类，均带有一种与日常生活相反的不真实性。

这些非日常情节往往是虚构的，但是在这一份想象的“虚”中却显露出实在的“真”，展现着虚构叙事下的真实心理。比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喻》卷十一）和《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警》卷六）中的赵伯升和俞仲举都是因诗词遭际君王，得到君王的赏识并因此得到高官职位，一跃成为人上人，之后仕途顺利，平步青云。这两篇作品正是渴望科举中第、步入仕途的秀才的一种美好幻想，折射出他们希冀通过偶然事件和天赐机缘实现自己的为官梦。再如一些小人物因掘藏金银而暴富的情节，直接显现出明代小市民对财富的直白追求和极度渴求，同时也暴露了某些市民想不劳而获发大财的懒惰思想。由此可以看出，“三言二拍”中意外得财、偶然机遇这类虚构叙事，实则真实折射出明代中后期市民普遍怀有的发迹梦想，揭示了市民阶层最具现实性的“白日梦”心理，也反映他们渴望发迹、梦想发财、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深度情感世界。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意外发迹”叙事的文化功能远不止于白日梦式的心理补偿。从叙事形式上看，这类叙事大量运用巧合、突转等偶然性手法，与“入仕”叙事的严整因果链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叙事的偶然性与非常规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症候：当制度化上升路径日益狭窄、常规流动渠道遭遇阻滞时，偶然机遇便成为文本层面的替代性解决方案。换言之，意外发迹叙事的盛行，恰恰暴露了常规阶层流动渠道的失效与市民阶层对可预期上升路径的焦虑。

此外，这类叙事还具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例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等作品，通过“才学-赏识-擢升”的偶然链条，实则对科场腐败、取士不公的社会现实构成了隐晦的讽刺。主人公的成功并非源于制度内的公平竞争，而是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偶然垂青，这本身就是对制度化渠道失灵的无声控诉。因此，“意外发迹”类叙事既是市民阶层对财富与地位的欲望投射，也是他们对社会结构性困境的文本性感知与想象性突围。

6. 结语

本文结合明代中后期的时代背景与市民阶层的生存状况，从叙事学视角切入，对“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流动的叙事类型进行了梳理。研究表明，在商品经济与启蒙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市民阶层追求财富、渴望平等的意识开始觉醒，并试图通过入仕、经商、入赘、意外发迹等多种途径寻求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在这些看似统一的“跃升”表象之下，不同叙事类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取向差异，折射出市民阶层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传统与变革、务实与理想之间的复杂张力。

“入仕”与“经商”两种流动路径构成了市民阶层价值取向的两极。入仕跃升叙事以其严整的因果链条，强化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条，显示出入仕作为跃升路径的主流地位。经商致富叙事则在肯定功利价值的同时，往往以后人读书入仕收束，形成叙事上的价值归位。这种叙事结构的不对称，深刻揭示出富商虽在经济上已然崛起，却仍未摆脱对传统士人身份的文化仰视。而入赘富商叙事以“寒士—富商”的联姻模式，实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交换，但在共赢的表象下隐含着士人阶层让渡家庭主导权的身份代价与身份焦虑。此外，意外发迹叙事大量运用巧合、突转等偶然性手法，其叙事的偶然性恰恰暴露了制度化上升路径的阻滞。偶然机遇成为文本层面的替代性解决方案，这既是对财富欲望的投射，也是对科场不公的隐晦讽喻。

因此，“三言二拍”中的市民阶层流动叙事，并非是对市民群体单一价值取向的简单反映，而是呈现出一个多元复杂、动态变化的意义空间。不同叙事类型之间以及同一类型内部的差异与矛盾，如入仕与经商的路径分歧、士商联姻中的利益交换与身份焦虑、意外发迹的幻想性与批判性的交织等，共同构成了市民阶层在崛起过程中真实而复杂的精神图景。由此可见，“三言二拍”中的市民阶层流动叙事，既是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渴望改变命运、追求社会地位的文学表达，更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期艰难探索、自我建构的文化印记，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晚期阶层流动的复杂样态提供了宝贵的文本依据。

参考文献

- [1] 李雯. 二十世纪“三言二拍”传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06.
- [2] 沈金浩. 论“三言”“二拍”的科举观与门第观[J]. 明清小说研究, 2000(4): 187-197.
- [3] 卢捷. 落魄文人出路的理想探索——略论“三言”“二拍”中的秀才形象[J]. 明清小说研究, 2009(2): 167-176.
- [4] 马衍. 世俗世界和精神家园中的文士范本——“三言二拍”和《六十种曲》文士形象比较[J]. 明清小说研究, 2010(1): 177-188.
- [5] 薛英杰. 阶层流动与科举压力: 晚明通俗小说中的文人赘婚故事[J]. 明清小说研究, 2020(4): 29-50.
- [6] 刘莉. 从“三言”“二拍”看晚明之徽商[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5(4): 37-41.
- [7] 王桂清. 从“三言”“二拍”中商人入仕途径看商人的官本位意识情结[J]. 北方论丛, 2004(2): 24-27.
- [8] 王永. “士商合流”与“贾而好儒”——从“三言”“二拍”看明中叶商品经济的特征[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96-99.
- [9] 胡小安.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中后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S2): 71-73.
- [10] 王言锋. 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与《三言》《二拍》的财富观[J]. 江淮论坛, 2005(4): 109-113, 171.
- [11] 管仲. 管子[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140.
- [12] 刘松来, 编著. 春秋穀梁传精解[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137.
- [13] 凌濛初, 编著.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M]. 张明高,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14] 冯梦龙, 编撰. 喻世明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5] 冯梦龙, 编. 醒世恒言[M]. 顾学颉,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6] 凌濛初, 编著. 二拍·二刻拍案惊奇[M]. 吴书荫,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17]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卷 1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1-112.
- [18] 冯梦龙, 编. 警世通言[M]. 严敦易,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9] 李贽. 焚书·续焚书校释[M]. 陈仁仁, 校释.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